

第五章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、現況 及對台灣的影響

前一章的要點指出，中國大陸的經濟形態包含顯著的政治性與計劃性，而高等職業教育的訴求目標顯然是職業導向，是屬於經濟的層面。所以大陸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自然與其經貿政策有極大的關聯性，基於此種關係便有必要討論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現況，及其對台灣的影響。

第一節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、現況

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主要原因乃在於，自 1978 年底開始採行的對外開放經貿政策，這種開放政策改變以往封閉的堅持。中共自 1949 年建國至 1978 年底為止，在這段期間中掌政的中國共產黨，堅持對外經貿策略採取封閉的政策。當時政治上主要的影響力是以毛澤東為主，因為他奉行馬克斯的思想，承襲史大林的模式，並以極左的意識形態來修正與發展，所以深富革命的意識形態（洪能平，民 83）。在當時集權的政治體制下，中國大陸逐漸走向搞個人英雄主義的情境。在這股毛澤東勢力的影響下，顯然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視西方國家的自由經濟，是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的溫床，所以極力要防堵西方的經濟體制進入中國大陸。又如前面所論述的此種西方的經濟體制，乃是在自然情境下人類所建構的結果。基於此種緣故，中共要防止在當時仍是農業社會的中國大陸，走向工業化的資本社會，只有靠政治與武力的途徑，將自己的國家圍堵成一個封閉的國度，使之不與外在的西方自由國家產生真正的經貿交流。這種固步自封的對外經貿措施顯露在

毛澤東主張的中國發展路線：

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，對付國外帝國主義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，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。」(洪能平，民 83：頁 32)

上述引文顯示出這種作法的目的在於，防止中國大陸走向西方資本社會的形態，而其手段往往是以政治的指令來隔離外國資本社會的經濟勢力。換句話說，在經濟上缺乏與外國的交流，中國大陸將處於某種封閉與孤立的狀態。另外，顯然掌政初期的中國共產黨，或是握有勢力的毛澤東等人，對於經濟的範疇仍處於摸索與學習的階段。國內研究者趙雲翼（民 85）便指出，執政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缺乏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，也沒有發展出適合自己國情的一套經濟政策。例如在 1957 年前所憑藉的只是，過去在革命時期所獲得小區域性的經濟工作經驗，而非全國性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。1957 年之後也非自我發展出的政策，而是採行蘇聯路線，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是此種路線的特色。在 1958 年採行的「平均主義」，其作法是典型的共產，共產意指工具、生活型態、產品分配的一致性，所以生產工具歸公、自留地取消、農民集體工作與生活、一起食用大鍋飯、無論勞動多寡分配上皆是同酬。

在這種不當的經貿政策下，再加上缺乏管理全國性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，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成果乏善可陳。最嚴重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舉動，更加深經濟的惡化。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發生，毛澤東將原本理論觀點的：「階級鬥爭不但是推動歷史發展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動力，而且也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動力」，付諸行動，所以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。這些不當措施

與舉動所累積的負面影響是顯然的，且深遠的：

「根據統計，1958到1962年，農業淨產值平均每年下降5.9%，輕工業下降2%，重工業只增長3%，職工每人平均實際工資下降20%，財政連續三年出現赤字，大陸人民活活被餓死的高達2,000萬人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。從1974年到1976年，全大陸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1,000億元，鋼產量2,800萬噸，財政收入400億。1976年全國工業企業的資金利潤只及1965年的一半，虧損企業達1/3以上，虧損金額73億元。職工的平均實際工資10年間不僅沒有提高，反而下降6%，農民從集體得到的收入也增加很少。」(趙雲翼，民85：39-40)

由上可見，在這種封閉經貿政策與不當政治行動下，導致當時中國共產黨表現出遠低於一般水準的經貿政績。在全國工業生產總值巨幅衰退的情境下，無論工人與農民的所得不是無明顯增加，便是下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人民生活水平根本無法提升，甚至每下愈況。

這種反自由經濟體制作法所導致的惡果，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從較簡單的原理來說，在工業化國家的人民之所以擁有極高的生活水平，如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，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業化社會中機械的大量生產。而大量的產品更需有銷售的市場，這種市場的含義往往是擴張至海外。國內的消費能力往往只能滿足某種程度的銷售市場。換句話說，更大量的機械化生產需求更大的市場，這便需海外的龐大市場，大量的生產便提供為數眾多的就業機會，在這種情形勞動者自然獲得比農業更高的收入。再者，工業化的持續更能改變既有的生產技術，工業的深化將需求更有技術與訓練的工人，此種情形亦會進一步提高勞動者的所得。社會學家 Dahrendorf (1959) 在其工業化社會的

觀念中，主張生產技術的深化，會改變既有的勞動力結構。在這種工業化的社會中，無技術的工人在總勞力中只是少數。相反的，此種社會需求大量有訓練、有技術的工人。再者，公司的營運與管理亦起變革，由於委託制度的產生逐漸需求為數眾多的經理人員。總結這些改變，勞動力是從無技術性走向有訓練、有技術，甚至是專業性的取向，所以其報酬亦會隨之提升。另外從整體局面而言，工業化的成功能提供政府更豐富的稅收，在這種情境下政府更有能力來改善社會的整體設施，這方面亦也有助整體生活水平的提升。

然而，開放政策前的中國大陸卻反其道而行，這種封閉政策致使其生產銷售市場，絕大部份情形侷限於自己的國內。再加上不重視民生工業的發展，與缺少資本投入的生產與研發，致使開放前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是乏善可陳。無論個別層面的勞動力個人收入，或是全國性的整體社會建設，都遠低於西方自由社會的水平。顯然，這種每下愈況的局面提供某種修正意識形態的機會，鄧小平的政治勢力便在此種情境再度竄起。在對外的經貿政策上，他主張以大膽開放的修政路線進行：

「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，來啟動和潤滑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，以搞活社會主義，深具改革意識形態的內涵。因此，鄧小平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也可說是要建立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。」（洪能平，民83：32）

由上述引文可見鄧小平不將西方的資本視為毒蛇猛獸，反而欲借助其力來改善中國大陸境內蕭條的經濟情況。然而，這種對外經貿開放的政策，及引進外資的作法，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產生某種程度的根本性衝突。因為，將與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相抵

觸。鄧小平的化解之道乃將經濟與政治分離，並調以文化獨特性的論調。所以他強調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資本化的社會主義仍是共產黨專政，所以在基本上並未悖離中國共產黨所定義的無產階級專政，並符合中國的特有國情。經貿的開放政策於是得到政治勢力的支持，只要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，皆可放手一搏。在「對內搞活，對外開放」兩大指導原則下，無論農村與城市的經濟體制皆進行根本性的變革，例如公營事業自負盈虧、開放沿海城市、建立經濟特區等便是其具體措施。

表三 中國大陸 1979 年起的實質國民生產總值 (Real GDP)

單位：百萬美元

年度	名目 GDP (1)	實質 GDP (2)	實質 GDP 成長率 (3)
1979	3998.1	3919.7	
1980	4470.0	4217.0	7.58%
1981	4775.1	4663.2	10.58%
1982	5182.3	5085.7	9.06%
1983	5787.0	5701.5	12.11%
1984	6928.2	6739.5	18.21%
1985	8527.4	7837.7	16.29%
1986	9687.6	9139.2	16.61%
1987	11307.1	10537.8	15.30%
1988	14074.2	11877.0	12.71%
1989	15997.6	13580.3	14.34%
1990	17681.3	17317.6	27.52%
1991	20188.3	19619.3	13.29%
1992	24362.9	23114.7	17.81%
1993	31380.3	27721.1	19.93%

資料來源：中國統計年鑑 1994。轉引自胡志強 (民 84：頁 3)。

這種開放政策顯然有著極成功的效應。其主要原因乃在於中國大陸擁有超過十億的人口，這種為數龐大的人口代表全球數一數二最大的潛在消費地區，當然還有其本身廣大的領土與豐富的資源，這些強大的誘因便吸引了可觀的外資。在 1993 年中國大陸所吸引的外資金額，在世界上排名第二，僅次於美國。至 1994 年底為止，總共有

221,718 個外資項目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，這些外資與中國大陸政府的協議金額，更高達 3,033 億 5800 萬美元，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則高達 956 億 5700 萬美元。這種經貿開放政策不但很成功的吸引自由經濟體系的資金，亦極成功的促進國內的經濟活動。從官方的統計資料中顯示，此種經濟改革與門戶開放政策直接促進中國大陸的高度經濟成長。表三的資料顯示出自 1979 年起，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 (GDP) 在金額上有極大的提升，從經貿開放政策的實施至 1993 年止，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從 1979 年的 3939.7 百萬美元激增到 1993 年 27721.1 百萬美元，在這段十四年間金額總數的成長超過 7 倍之多。1981 與 1983 年之後每年的 GDP 皆呈現二位數字的高度成長，在 1990 年更高達 27.52% 的成長率。

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台灣間的經貿與投資活動

顯然，已間隔數十年未有實質交流的臺海兩岸間關係，亦受到這種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影響。雖然我方在政策上尚未有明顯的改變，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台灣經濟體，一向注重靈活彈性的策略，仍透過各種的途徑與中國大陸，進行少量與間接的經貿活動。如根據統計，在 1980 年，台灣廠商便對中國大陸輸出約兩億三千四百九十七萬美元的貨品 (簡宏志，民 83)。在不同來源的資料亦證實此種事實，從表四中的資料，我們可清楚地看出在 1981 年，政府對中國大陸經貿往來解禁前，台灣的企業便已對彼岸間接輸出貨品。當年臺海兩岸間間接貿易總額的估計值，更高達四億六千萬美元。之後的 1982 與 1983 年這兩年間，兩岸轉口貿易金額轉趨減少，這種衰退的主因在於是受到兩岸經貿政策的影響 (夏樂生，民 85)。特別是中國大陸